

晚清中國統治格局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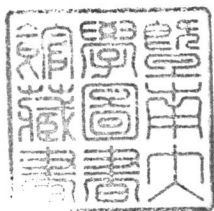


張研
牛貫杰 著

50071

晚清中國統治格局研究

張研 牛貫杰 著



雲龍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晚清中國統治格局研究 / 張研、牛貫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知書房. 2005〔民 94〕
面；公分. --（中國史研究；19）

ISBN 986-7151-00-3（平裝）

1. 中國 - 歷史 - 晚清（1840-1911）

627.6

94016425

晚清中國統治格局研究

中國史研究 19

作 者：張研、牛貫杰

發行人：謝俊龍

執行編輯：陳聖元

製 作：雲 龍

出 版：知書房出版社

106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58 號 6F

讀者服務部 Tel：(02) 2363-7938、2368-4403

Fax：(02) 2367-5949

編輯部 Tel：(02) 2364-0872

Fax：(02) 2364-0873

發 行：知書房出版社發行部

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36 號 B1

Tel：(02) 2363-7938、2368-4403

Fax：(02) 2367-5949

初版一刷：2005 年 10 月

定 價：450 元

郵撥帳號：16039160 知書房出版社

網 站：<http://www.clio.com.tw>

E-mail：reader@clio.com.tw

※版權為知書房出版社所有，請勿翻印※

ISBN 986-7151-00 -3

Printed in Taiwan

目次

導言·····	001
---------	-----

一、關於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研究的理論與視角	／001
----------------------	------

二、關於中國傳統社會的雙重統治	／010
-----------------	------

三、關於基層社會結構	／015
------------	------

四、關於以十九世紀中期戰亂時期作為研究時段的選擇	／021
--------------------------	------

五、關於以安徽作為研究切入點的選擇	／025
-------------------	------

上編 十九世紀中期戰亂之前安徽的雙重統治格局

第一章 政權設置與綠營汛防·····	031
--------------------	-----

第一節 縣以上軍政設置	／031
-------------	------

一、安慶	／040
------	------

二、皖北皖中	／042
--------	------

三、皖南 / 047

第二節 縣以下軍政設置 / 052

一、行政區劃 / 057

二、行政組織 / 068

三、防衛體系 / 073

第二章 宗族組織與鄉族組織 / 083

第一節 自然社區與宗族組織 / 083

第二節 經濟社區與鄉族組織 / 090

一、市場網絡 / 090

二、水利設施 / 104

第三節 精神社區與鄉族組織 / 112

第三章 戰亂之前的統治秩序 / 121

第一節 雙重統治的格局 / 121

一、上層統治對基層統治的依賴 / 122

二、基層統治對上層統治的依賴 / 147

第二節 雙重統治格局中力量對比的變化 / 158

一、士紳對地方事務干預力度的增強 / 158

二、政策法律的變化	／ 176
-----------	-------

附錄三——	／ 185
-------	-------

附錄三——	／ 187
-------	-------

中編 十九世紀中期戰亂之中安徽的雙重統治格局

第四章 戰亂對雙重統治格局的檢驗與挑戰	 191
---------------------	-----------

第一節 不堪一擊的上層政權	／ 191
---------------	-------

第二節 基層社會各實體組織的表現	／ 204
------------------	-------

一、積極維繫基層統治秩序	／ 204
--------------	-------

二、蒙城士紳在戰亂中的表現	／ 210
---------------	-------

三、戰亂中基層社會組織的異動	／ 219
----------------	-------

第三節 雙重統治格局的再審視	／ 239
----------------	-------

第五章 雙重統治格局調整與再建的努力	 257
--------------------	-----------

第一節 保甲與團練——雙重統治格局調整的出發點	／ 257
-------------------------	-------

第二節 團練大臣	／ 272
----------	-------

第三節 從練勇、勇營到練軍及勇營留防	／ 323
--------------------	-------

下編 十九世紀中期安徽凸顯的政治力量

第六章 十九世紀中期安徽凸顯的政治力量之一：捻軍……347

第一節 對捻軍領導層的考察 / 347

一、黃旗 / 353

二、白旗 / 356

三、紅旗 / 362

四、藍旗 / 365

五、黑旗 / 371

六、其他 / 375

第二節 捻軍起事緣由與雙重統治格局 / 381

一、捻軍各首領起事的具體緣由 / 381

二、捻軍起事緣由與皖北的雙重統治 / 394

第七章 十九世紀中期安徽凸顯的政治力量之二：團練……413

第一節 團練的演變及興起 / 413

第二節 十九世紀中期安徽的團練 / 442

第八章 從圩寨與基層社會的高度軍事化

看基層社會整體力量的凸顯.....455

第一節 捻軍的圩寨 / 455

第二節 皖北的官圩 / 466

第三節 個案：渦陽、太和兩縣的圩寨 / 494

第四節 戰亂後期曾國藩在皖北的清圩 / 511

附錄八一 / 529

附錄八二 / 533

結語.....535

參考書目.....539

後記.....547

導言

一、關於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研究的理論與視角

十九世紀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十分特殊的時期。中華民族的發展處於亙古未有的大變局中。變革的時代、變革的主體與客體，將一切舊的因素與新的因素、舊的角色與新的角色召喚到歷史的舞臺上來，集中上演著人們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的活劇，反映著可能出現的歷史的多元化走向和必然選擇的那一條道路——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這無疑為關注中國在社會大轉型期間發展方向和發展規律的人們提供了最為鮮活的樣板，吸引著歷史學家爭相從各種角度、以各種理論研究和表述這一歷史進程。

這些視角與理論，可最為簡單地概括為「內視」與「外視」、「內因決定論」與「外因決定論」。長期以來，人們從理論上、情感上一致反對和批判「外因決定」論、「西歐中心」論，但實際上卻受其影響至深，往往以西歐近代化作為標尺，衡量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直至今

日，仍有一些似新實舊的理論與視角，如「對西方衝擊回應」的「衝擊—反應」模式，以西方現代化為模式探討「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或西方化」的「現代化理論」，「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第三領域」等，影響著人們對十九世紀的中國社會做出合乎歷史實際的認識與闡釋。由於研究方向、視角、理論的局限，以往關於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的研究，儘管不乏啓迪後人的扛鼎力作，卻從整體上存在著缺憾。

二十世紀後半期，史學研究的重大進展在於較為徹底地突破了「西歐中心」論。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俯瞰中國近代的新視角》（載《清史研究》，二〇〇一年第二期）、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二〇〇〇）、中國學者吳承明《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云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三聯書店，二〇〇二）等論著，均對十九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研究產生了震撼性的影響。先驗的印象，空泛的格局，以概念詮釋概念的討論，最終必然讓位於對歷史自身細微的描述與挖掘，必然讓位於以歷史說明歷史。如同溝口雄三先生講述的一位木雕家那樣——他並非在以樹木為材料雕刻佛像，他只不過是把鎮坐在樹木中的佛陀請出來而已。^①

然而，十九世紀畢竟爆發了外國列強侵略中國，或者說用堅船利砲打開中國大門的鴉片戰爭。這一戰爭留給人們想當然的膚淺印象是：中國原有的發展道路被阻絕了。就像一棵樹，被生生攔腰砍斷，插上了一把金屬傘。於是，被砍斷的那一刻——鴉片戰爭，便成了一道分水嶺，一道舊與新、古代與近代、傳統與近代化的分水嶺。事情似乎變得直觀：本來任何樹冠都是樹木長

成的，任何近代化包括西歐的近代化都與其傳統有著直接聯繫和親子關係，但中國的「傳統」與「近代」卻變成了毫無內在關聯、截然對立的「土」與「洋」的矛盾。所有「土」的東西均代表落後，均屬於傳統的舊的古代；所有「洋」的東西均代表先進，均屬於新的近代。由於金屬傘不是樹冠，人們無法研究樹木如何長成樹冠，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多方求證、潛心研究的，或者實際是樹木與金屬傘的對立；或者實際是樹木與金屬傘的關聯——樹木如何在受到砍伐後自身肌體發生了反應，長出了金屬傘。這實在是十九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研究的誤區。

誤區發生的根源之一，是人們受「西歐中心」論的影響，認為先進的西歐既已揮舞鴉片戰爭的巨斧，那麼斬斷中國古老朽木、即時插上金屬傘便無可非議。因為王朝統治的衰落和傳統社會內部結構的長期穩定性，使中國成為缺乏歷史演進活力與動力、永恆不變的停滯性社會，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喚醒它、打破其「傳統平衡」和「貧困循環」、使其古老文化受到徹底掃蕩、從而得到解脫的決定性力量。連馬克思也受到影響，把中國視為「木乃伊」式的社會，在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放棄閉關鎖國的形勢下預言：「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②

面對歷史，人們有太多先入為主的印象。

① 參見〔日〕溝口雄三：《俯瞰中國近代的新視角》，載《清史研究》，二〇〇一（二）。

②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二版，第一卷，六九二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

人們以爲歐洲一日開始了工業革命，便自然成爲全球化經濟的中心。歷史的事實則是：當時多邊貿易關係及世界分工的全球經濟中心，仍處於以中國爲代表的亞洲，開始進行工業革命的歐洲則處於邊緣。儘管工業革命、產業化以及資本主義向海外擴張的必然性，推動歐洲以從殖民地美洲攫取的白銀開路，企圖擠上以中國、亞洲爲中心的世界經濟列車，改變其格局，最終占據中心的位置。然而遺憾的是，甚至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企圖也不能說變成了現實。

一八五二年，廣州一位叫做米契爾的英國官員報告了中國的情況：「在收穫完畢以後，農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齊去梳棉、紡紗和織布……這個國家9/10的人都穿這種手織的衣料，其質地各不相同，從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細的本色布都有……生產者所用的成本簡直只有原料的價值。」他不無沮喪地說：「我們的製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這種做法的令人讚嘆的節儉性，以及它與農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說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會一目瞭然，以粗布而論，他們是沒有任何希望與之競爭的。」^①

米契爾所報當時中國的情況，長期以來被「歐洲中心論」影響下的人們視爲封閉落後、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典型。但正是以這種家庭手工業爲主要背景的中國，擁有無論從人均產值、收入、消費還是內外貿易均在當時世界上起主導作用、「最先進、最複雜」、最終非鴉片不足以擊垮的經濟。如貢德·弗蘭克所云：「儘管歐洲人獲得美洲的金銀並以此買通進入亞洲的世界經濟的道路，但是在一五〇〇年以後的三個世紀裏，他們一直是一個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適應——而

不是制訂！——亞洲的世界經濟遊戲規則……亞洲人在世界經濟中仍然是成功的競爭者。」即便從科學、技術上看，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與當時歐洲相比，也往往是「技高一籌」。②西歐並非絕對先進，鴉片戰爭也並沒有即時斬斷中國之樹。

另一方面，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這半個世紀，西方列強並沒有在中國之樹上嫁接金屬傘，只是在拚命向中國推銷紡織品和鴉片。著名學者吳承明先生指出：中國洋務派和民族資產階級跨越了西方產業革命初期的「紡織工業」時代，跟上了西方產業革命第二階段「蒸汽和鋼鐵」時代的潮流，直接向西方尋求「機船礦路」，自行創辦了中國第一批機器製造廠、機械採礦業、鋼鐵聯合企業、實用化鐵路。這些工業不僅是進口替代工業，而且是追趕時代的工業。由於其時以製造兵器戰艦為主，中國造槍水準與國外的差距從三十七年縮短到二十年，再到十二年，最後為六年；造艦水準與國外的差距從十六年縮短到八年，最後為六年。③這些近代化企業是中國之樹自生樹冠的組成部分，而不是西方列強插在中國之樹上的金屬傘——外國資本投資這些企業是在甲午戰爭以後，亦即中國人創業二三十年後的事情。

涉及經濟發展的社會性制度性基礎，人們以為，產業革命以後的歐洲一定與民主自治、與最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二版，第一卷，七五八頁。

② [德]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二五六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二〇〇〇。

③ 參見吳承明：《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

優化的社會結構和運行體制相聯；而專制獨裁、泥古不化、運轉窒滯則是當時中國的特色。歷史的事實則是：那些進入或即將進入產業社會的國家、地區，其突出特點是國家的專制統治一直達於末端；而中國，其縣以下基層社會的自治因素卻不但始終存在而且日趨活躍。

歐洲農村在中世紀普遍存在古老的民主自治的教區制度。每座村莊的居民都曾組成有別於領主的集體。領主利用、監督和統治這種集體。但這種集體共同占有某些財產，通過民主方式選舉自己的首領，自行管理。而資產階級革命前的歐洲，譬如法國，只是在表面上還保留著它在中世紀曾經有過的民主特色的一部分，如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所說：就像一個死人和一個活人相似一樣。大部分教區仍有選舉產生或被認為是選舉產生的市政官員——徵稅員和理事；當選舉市政官員或討論某一公共事物時，村裏的鐘聲便召喚農民聚集到教堂前，窮人和富人同樣有權出席，表達各種心願。但是，那些市政官員實際上已變成國家的工具而不是社區的代表：徵稅員按照總督的直接命令徵收人頭稅；理事在總督領導下代表其處理有關公共秩序或政府的一切事務；基層教區的民眾集會，只有在求得總督明確批准後才能召開，無權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從「修補被風刮壞的教堂屋頂」到「開支二十六里佛」、一切都須御前會議裁決，「距巴黎最遠的農村教區和最近的教區一樣，都得服從這種規章」；民眾普選的候選人通常由總督指定而獲全票通過，如出現自發舉行的選舉，總督必撤消之而親自任命，同時無限期中止一切新選舉，「這種例子數以千計」。

中央政府最下層的代理人即總督，逼迫這些社區官員百依百順，並常常處以罰金，有時還將

他們下獄。一七五〇年一位總督說道：「我把私下抱怨的幾個村社負責人關進了監獄，我強迫這些社區支付騎警隊騎兵巡邏的費用。這樣一來他們就被輕易地制服了。」當時「幾乎所有富裕和有知識的人」都「陸續逃往城市」，「教區內除了領主以外只剩下一群無知粗陋的農民」，「教區就是一片茅屋和與茅屋一樣被動的居民」，「他們根本沒有能力領導治理公共事務」。托克維爾說，這種情況「差不多可以延伸到幾乎所有獨立自主、具有集體屬性的團體」①。

歐洲城市原是與領主國對立的自治的市民社會。資產階級革命後，歐洲作為市民社會自治的城市衰落了。布羅代爾援引路易·蒙福特的觀點指出：「新興的資本主義」用新的商業貴族的權力取代了「封建主和行會市民」的權力時，固然掙脫了中世紀城市的狹小範圍的束縛，但是最終又把自己綁在國家身上。國家戰勝了城市。②

沒有一個城市、鄉鎮、村莊、濟貧院、工場、修道院、學院能在各自的事務中擁有獨立意志，能夠照自己意願處置自己的財產，「政府把全體法國人置於管理監督之下」。如果說，「蠻橫」這個字眼在當時尚未造出，那麼，「至少它在事實上已經存在了」③。

產業革命以後出現的殖民地和處於殖民地邊緣的國家、地區，其自治、民主更顯現出空洞和

① [法]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八十八～九十一頁，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二。

② 參見 [法] 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六〇六～六一〇頁，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三。

③ [法]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九十～九十一頁。

虛假。由於宗主國的專制統治，「國家只剩下一個空架子」，「例如波蘭就是如此」。「十八世紀的意大利同樣不再有真正的政府」，馬費伊伯爵於一七三六年說：「人們議論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就像議論羊群和其他下賤牲畜一般。」人們發現，後來殖民地的獨立會造成突然的權力空缺，「在結束了殖民地的假國家後，必須從無到有地建立一個新國家。於一七四七年建立的合眾國花費了很長時間，才使聯邦政府成爲一個協調有效的政府。這個過程在其他美洲國家也很慢」。^①

可以看到，西方產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以後，中世紀原有的自治、民主，從農村到城市，均被納入國家強有力的統治下，「自治共同體」名存實亡，與國家專制統治末端合而爲一。

而在中國傳統上則是「國」與「家」的雙重統治，即所謂的「家國網絡」。

在地廣人多的中國，「國」之概念下中央集權制行政的實際狀態極爲粗放。而「家」之概念下縣以下基層社會的宗族、鄉族等組織系列則在行政、司法、經濟活動、精神生活等方面，成爲國家末端政權的補充，起到了所謂「結構——功能替代物」的作用。

中國傳統社會的基層社會實體組織不是國家直接統治的「非自立的存在」，也不是獨立於國家之外、如同歐洲「市民社會」、「公共領域」那樣與國家對立的自治的「秩序空間」，而是同國家上層政權以「共同社會性」與「利益社會性」互爲表裏、持有共同秩序觀念、表現爲雙重統治的一個整體。這樣的一種結構，使一些學者認爲：比照歐洲「市民社會」、「公共領域」，討論十九世紀中國傳統社會中國家與社會之間界域的伸縮，變得甚少實質性意義。而稍後出現的所

謂「第三領域」的理論，雖然意欲說明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結構獨特的整體性，卻由於同樣在不自覺地比照歐洲，以國家、社會的對立為前提，仍然不得要領。

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先生說：「同樣的『西方的衝擊』，帶給日本的是天皇制度下中央集權式絕對主義國家，帶給中國的是廢除帝制後的各省獨立即地方分權的共和制國家；而二戰後帶給日本的是私有權的確立，帶給中國的則是公有制。其間的差異若不從二者各自前近代的差別去看，是無法說明清楚的。也就是說，至少就日本與中國而言，『衝擊』並沒有破壞前近代以來的結構，也沒有使其崩潰，而只是促成了各自前近代的蛻皮，至多使其有些變形而已。」^②

誠如其言。十九世紀鴉片戰爭的「衝擊」，並沒有使中國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崩潰。從經濟發展上看，從鴉片戰爭前後到甲午戰爭後的數十年間，中國經濟仍然基本沿著固有的道路前進；從政治結構、統治秩序看，鴉片戰爭前後到太平天國爆發的數十年間，中國社會仍然保持著基層社會三大系列組織縱橫依賴、鄉紳官僚上下流動、國家政權與基層社會實體組織雙重統治的格局。當然，已完成產業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列強有著當時中國不能與之匹敵的發展「後勁」，中國因之「挨打」。尤其令人扼腕嘆息的是，於「蛻皮」之際「挨打」並終被打得「遍體鱗傷」的悲慘結局，是在一開始就注定了的。

① [法] 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四十一頁。

② [日] 溝口雄三：《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三十八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